

穷书生破解高速路连环追尾难题

创造激情来自一场车祸

2004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湖北房县人赵鸿权百无聊赖地躺在偏远的竹溪河水库监理部宿舍。室外,黑幕笼罩着大地,死一般沉寂。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才将这死气沉沉的氛围击碎。

劳累了一天的他,躺在床上显得疲惫不堪。自从买断工龄下岗后,赵鸿权就一直奔波在荒野,为各地处险加固的中型水库担任工程监理。尽管工作地点飘荡不定,但他还是感到一丝安慰,毕竟每月能按时领到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薪水。

这天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借着灯光一边随手翻看报纸,一边想着家中的妻儿。

突然,报纸上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闯入他眼帘:一条高速公路,正在处理车祸现场的交警后面疾驰而来的车辆撞飞!整个交通事故造成6死1伤。

赵鸿权的心被震撼了。他当时就想,既然前面已经发生了车祸,紧跟而来的汽车在不知险情的情况下,该如何躲避车祸禁区,从而避免追尾惨剧的再次发生?如果能够设置预警系统,提醒司机们前面有车祸发生,需要减速,这样不就可以阻止二次甚至三次事故发生了吗?

整整一夜,赵鸿权都在深深思考着。

他想,高速公路和一般普通公路有所不同,高速公路由于车速快,当前方发生事故后,刹车制动距离不足,容易发生追尾碰撞,导致连环追尾事故发生。特别是有时交警在高速公路上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停在事故现场的警车会被后方车辆追尾撞毁,并严重

威胁交警的人身安全。“不能让连环追尾事故再上演了!”赵鸿权突然萌发出解决这种问题的想法。

“门外汉”顶着嘲笑钻研

今年35岁的赵鸿权出生在湖北房县白鹤乡。1987年,初中毕业的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邵阳一中,但在家务农的父母实在没钱供他读高中。就这样,从小立志要上大学的他因为家庭的贫困,过早地与大学失之交臂。

随后,赵鸿权来到设在武汉的湖北省水利学校读了4年中专。弹指一挥间,4年转瞬即逝。毕业后,他被分配至邵阳地区水利工程队工作。到了1996年,单位效益开始下滑,工资也渐渐发不出来了。

如果继续呆在原单位,必定是坐以待毙。2003年,赵鸿权以1.3万元被买断工龄,成了一名下岗职工。怀揣失业证,他开始一边销售黄酒,一边在工地上打工。其间,他仍然不忘读书,通过自身努力,

还获取了水利工程专业工程师职称。

下岗不矢志。2003年,赵鸿权进入湖北十堰市十水科技咨询服务部工作。那时,各地纷纷开始着手为中型水库处险加固。由于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赵鸿权在施工现场担任工程监理。

从2004年开始,他每天利用3个多小时的时间研究高速公路事故后期预警系统的设计。多少次,他一个人在空寂的房间里苦思冥想;多少个夜晚,他埋首桌案,认真摸索着画出一张张图纸。当有人了解到学水利专业的他,居然研究起交通事故预警。一时间,怀疑、嘲笑的言语如潮水般向他涌来。然而,赵鸿权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方向,不去理会外人的流言蜚语。每天一下班,他就钻进办公室,静静研制着预警系统。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实验,2005年3月份,他研制的高速公路后期预警系统终于成功了。



赵鸿权不知道该何时能造福社会

在研制过程中,苦于不是专业出身,赵鸿权一时无法画出精确的图纸。于是,赵鸿权找到毕业于湖北大学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同事,请他帮助完成最后电路图的绘制。为此,赵鸿权拿出1千元现金表示感谢,但对方摇摇头婉言谢绝了。

诚恳的赵鸿权又主动拟订一份协议,协议称,此项目若能投入使用,纯收入的20%归该同事所有。在他的反复劝说下,这名同事只好签了字。

报警原理其实并不复杂

2005年3月,赵鸿权准备将他研制出的高速公路事故后期预警系统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报国家专利。

按有关规定,申报此专利需交一笔不菲的费用。十堰市专利局审查后认为,该项目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并考虑到他的实际经济条件,遂为其减免了大部分费用,但仍需交纳千余元。

这个时侯,10年前就已下岗的妻子闻讯后,从拮据的生活中挤出钱来交给丈夫,支持他申报。赵鸿权紧紧攥着这把钱,感动得泪流满面。

2006年7月12日,经过严格把关,国家知识产权局为其颁发了专利证书。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该系统增加了预警距离,可以有效避免汽车追尾的二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在现有报警系统中,还没有针对高速公路很实用的事故后期预警系统。

“驾乘人员进入高速公路,在领取缴费卡的同时,配置遥控触发器。当高速公路上前方两车相撞后,轻点触发器按钮,前后500米自动报警,追尾将不再发生。”赵鸿权告诉记者,他研制的这种高速公路事故后期预警系统,主要是在高速公路两侧全程安装信号控制器外加声光报警装置,每一个信号器有电源输入线和两根信号输出线,分别控制信号器前方和后方报警。

“当高速公路路况不良或发生事故不宜通过时,可由现场人员(驾乘人员、交警、路政)用手启动遥控触发器,触发器产生脉冲信号给路旁的控制器,控制器随即会启动事发点至控制器之间的红灯,红灯闪烁并语言提示车辆停车;而控制器与后方相邻控制器之间500米处设置的黄灯则也同时闪烁,语言提示后方车辆安全减速。当然,对随意启动触发器,恶意扰乱交通秩序者,有关部门可依法给予惩处。”赵鸿权说:“有了500米的缓冲距离,就可以有效避免事故发生或事故扩大。”

关注者多但目前尚未推广

据了解,赵鸿权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报时,还同时可以

提出国际申报。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再次申报的资金,超过了申报期限,现在已经无法再进行国际申报。“真的很遗憾,如果实现了国际申报,外国一些发达国家今后要使用这种预警系统,就必须花钱买我们的专利,中国人就可以大把大把地赚外国人钱。”赵鸿权激动地说。

“穷书生”赵鸿权拿到专利证书的消息,一夜之间炸开了锅。连日来,全国各地多家公司给他写信并打来电话,协商合作或转让事宜。

“这些单位是真真假假,实在难以辨别。我本想去北京一趟,但经济不允许啊!”赵鸿权显得无可奈何。他坦言,如果现在将该系统推广出去造福社会确实需要时间,但眼下又无法放下手头上养家糊口的监理工作,更没有钱去北京考察这些公司。

2006年6月,湖北省政府组织了专利技术推广会,十堰市有关部门组织了9个项目参与此项活动。赵鸿权研制的高速公路事故后期预警报警系统名列其中。可是,由于工作时间关系,赵鸿权未能参加活动。

那么,这种预警报警系统如果全面推广后,市场前景又是怎样的呢?赵鸿权分析说,如果高速公路每公里只收取100元的专利费,全国的直接经济效益就是400万元。如果批量生产配套的遥控触发器,经济效益更是可观。“由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完全可以向国外输出此项技术及设备。”

日前,赵鸿权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项目已经进入法律授权公开阶段,现在急需结识有实力有远见的企业,共同开发和推广。(未经许可,谢绝转载和上网)

朱江 敖琼 文/图

爱妻乳房被误切 丈夫倾情抚伤痛

2006年4月3日,崔月美在丈夫何勤陪同下,拿到了医疗事故赔偿金。走出北京某医院大门时,崔月美眼中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了——她那只美丽的乳房就是在这里被活生生地误切了!这近8万元的赔偿金,又怎能抚平她内心的伤痛!怎能还给她女人的自信和美丽啊!

一次错误的手术

2004年国庆节的早晨,崔月美一大早就起床了。她穿上新买的一件大红紧身套头羊绒衫,兴致勃勃地站在镜子前。因为今天要和丈夫一起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当目光落到自己的左胸时,她仿佛一下就成了霜打的柿子——那是怎样的一个“乳房”啊!与右侧高耸挺拔的乳房相比,那里歪歪扭扭,明显地塌陷着。

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崔月美拿起电话,是好朋友陈英打来的:“月美,我昨天晚上听一位当医生的亲戚说,你的乳房可能是被误切的。她说,像你这样的情况,根本没有必要做乳房切除术。”

崔月美愣了,误切?这简直太可怕了,她不禁浑身一阵颤抖。3年多了,因为失去一只乳房,她和丈夫忍受着怎样的煎熬啊。

1984年,22岁的崔月美人介绍认识了与她同岁的技术员何勤。崔月美对老实厚道的何勤很有好感,而何勤更是对美丽善良的崔月美一见倾心。当年国庆节,他们幸福地步入了婚姻殿堂。

结婚一年半后,崔月美生下女儿。她很怕因为生育哺乳而造成乳房下垂,因此,无论带女儿多么辛苦,她都时常按摩。由于坚持不懈,她的乳房一直如少女般高耸着。

1996年,崔月美下岗后,在城东的一家市场租了个服装摊位。经过几年打拼,她不仅有了自己的服装店,还办起了一个服装厂,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而何勤也通过奋斗,被聘为工程师。

2001年2月18日晚上,崔月美按摩乳房时,突然发现左侧腋下有一个小肿块。她神情惊慌地对丈夫说:“你看我这儿怎么了?”何勤赶紧用手摸了摸,立即如临大敌,第二天他拉着妻子就去了北京某医院就诊。经医生检查,诊断为:“左腋下肿块、左乳腺癌转移性肿块?”

何勤嘴上安慰着妻子,其实他心里比妻子更着急。他跑去找医生,医生告诉他,必须做手术,然后做病理化验,才能确认是不是癌。

2月21日,手术终于做完了,医生告诉他,病理结果为淋巴结结核,不是癌。这一下,何勤才松了口气。

3月2日,崔月美出院了。出院没几天,崔月美就觉得左侧乳房总是隐隐发疼。何勤帮她查看,发现她左侧的乳房发红,并且又有了一个肿

块。3月13日,何勤陪着何月美再次来到北京某医院。

3月16日,医院决定再次为崔月美做手术。手术前,医生对他们说,只是切一小块,然后做切片化验:如果是良性的,就不用做了;如果是恶性的,就要做全切除。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在手术中,医生根本就没有做病理化验,就武断地将崔月美的左乳切除了。

逾越性生活障碍

3月27日,何勤将妻子接出了院。在何勤的精心照顾下,崔月美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

尽管何勤对自己比过去更好了,但崔月美的心里仍然不踏实,她爱丈夫,又怕丈夫嫌弃自己。细心的何勤发现了妻子的内心活动,他知道,只有像过去那样和妻子亲热,才会消除妻子的顾虑。

那天晚上,何勤上床后主动搂住妻子,开始亲抚她。尽管他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可当他习惯性地去抚摸妻子的乳房时,他还是一下子败下阵来,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崔月美默默地躺在丈夫的怀里,泪水悄悄地滑落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何勤再次尝试,但仍然以失败告终。在接下来的近半年时间里,何勤的努力都无法成功。望着丈夫那痛苦的表情,崔月美心如刀绞,她知道丈夫已经尽力了。

两天后,崔月美将《离婚协议书》递到何勤面前。何勤一把将它撕了个粉碎:“我不同意离婚。”崔月美跌坐在沙发上,捂着脸哭了:“你不该跟着我一起受罪啊。”

丈夫不同意离婚,崔月美想到了死。一天,崔月美趁丈夫上班,将偷着攒的那瓶安眠药全部吞进肚子,她想以死来解脱。

也许是夫妻间的心灵感应吧,那天何勤上班总是心神不宁,感觉到要出事。他请假回家,看到已经昏迷的妻子,立即将她送到医院。经医生抢救,崔月美才脱离了危险。

其实,何勤一直都是爱妻子的,可是他一看到,甚至想到妻子那像毛毛虫一样难看的伤疤,就再也没有了男人的生理冲动。

为了让自己走出心理障碍,何勤悄悄去看了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他慢慢开始接受妻子有缺陷的身体。在崔月美做完手术两年后,他们终于又找回了过去的欢爱。

打赢误诊官司

就在崔月美和何勤渐渐接受了这一现实时,却突然得知崔月美的乳房可能是被误切的。何勤一拍桌子,将桌上的杯子震得直抖:“如果证明医院真的误切了你的乳房,我绝饶不了他们。”

春节期间,崔月美和何勤再也无心过年。为了证实妻子的乳房是否被误切,何勤又一头扎进了图书馆。终于,他查到了想要的资料。在乳腺癌切除术一节中,明确地写着,术前应做充分消毒,术中要做病理切片化验,结果是恶性者,才可实施切除手术,术后需进行化疗。在医疗事故认定中,

也明确提出像崔月美这种情况,应属于医疗事故。

望着书上的白纸黑字,何勤把牙咬得“咯咯”直响,拳头握得紧紧的。春节长假刚过,他就来到了北京某医院,找到当初为崔月美做手术的医生。面对质问,那位医生却振振有词:“我们做手术都是有充分依据的,怎么可能随便切呢?”面对医生的强硬,何勤暗暗发誓:“无论多么艰难,我也要为我们所忍受的那不堪回首的痛苦讨个说法。”

何勤请了一位当地著名律师,律师告诉他,拿到医院当初的病历是关键,但医院是不会轻易把病历交给病人的。何勤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第二天,他陪妻子来到医院,谎称崔月美右侧乳房也开始疼,想到别的医院就诊,希望把病历复印一份,好作为参考。医院也许没想到一对普通的患者夫妇会和他们打官司,就为他们复印了病历。

何勤让妻子安心忙生意,自己请了假,拿着这份病历,来到区卫生局提出鉴定申请,区卫生局委托区医学会进行了事故鉴定。2005年3月21日,区医学会做出了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拿到鉴定结果,何勤和崔月美悲愤至极。

何勤觉得打赢官司,就是表达自己对妻子爱的最好方式。2005年4月初,他来到北京市医学会申请鉴定。7月21日,北京市医学会做出鉴定结论:本病例属于三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负主要责任。崔月美手捧鉴定结果,哭跪在

地:“我的乳房被切得冤啊!冤啊……我的乳房啊……”

拿着鉴定结果,何勤来到北京某医院,要求赔偿。然而医院却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不同意赔偿。何勤转身走出了医院,拨通了妻子的电话:“月美,我决定到法院起诉。”

就在何勤去找律师,准备将北京某医院告到法院时,他接到了单位领导的电话:“你请假太多了,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单位的工作。如果你再这样下去,后果自负。”

2005年9月2日,何勤作为妻子的代理人,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院赔偿医疗费、继续治疗费、误工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20万元,精神抚慰金3.7万元。

由于何勤经常请假找律师、取证、上法院等,工作受到极大影响。2005年11月,厂里决定让何勤下岗了。

2005年12月,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何勤到庭动情地讲述了4年多来妻子所受到的痛苦。最终,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北京某医院赔偿崔月美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继续治疗费共计73900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崔月美和何勤觉得这点赔偿金远远无法补偿他们受到的伤害,于是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得知他们上诉后,医院方也以原告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提起了上诉。2006年3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双方的上诉,维持原判。2006年4月3日,崔月美拿到了医院的赔偿金。

(文中人物为化名)
未经许可,谢绝转载 心心